

一位摄影家镜头外的人生(上)

■阮义忠

阮义忠,被誉为“中国摄影教父”的著名摄影家,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。曾在介绍台湾传统文化的《ECHO》杂志(《汉声》杂志前身)任艺术编辑,这个工作让阮义忠第一次透过观景窗看世界,更让他重新面对童年时千方百计摆脱的乡村,走向“从土地汲取力量的人”——这是阮义忠通过镜头注视土地、体察生命的开始。在其三十年的摄影生涯中,他持续以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,专注记录台湾社会的变迁,他的五部摄影集《北埔》《八尺门》《人与土地》《台北谣言》《四季》使他成为受到海内外瞩目的摄影家。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其创作三十年来第一本个人随笔集《想见 看见 听见》,以真挚隽永的文字娓娓讲述他摄影艺术之旅中有感触的故事和思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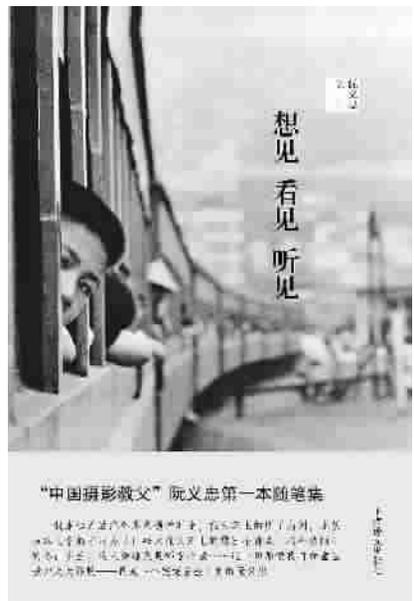
爱哭的童年

很少回忆儿时的情景,因为我的童年仿佛没有欢乐可言。一想到我就会赶紧打住,让思绪转个方向,免得碰触到无所不在的隐痛。

大概是这个缘故吧,日子久了,我竟变得有往事健忘症,留在记忆中的孩提事情,每一桩都只是残缺片段,连不成一则稍微完整的情节。印象最强的反倒是结局;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经验无论是怎么开始和发展的,最后都是不愉快地收场。因此,我大半只记得伤痛,而忘却其它枝节了。

在我童年的那个年头,台湾的经济还是很差的,乡下人只有靠极为认命的勤奋和节俭,才能勉强养家。继承祖业木匠的父亲有九个小孩子要养,把所有体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、凿子、铁锤和一批批木材堆里;唯有如此,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担子。

他那一日日弯驼的背、一日日衰老的容颜、一日日稀少的头发,始终就不曾给孩子们慈祥亲切的感觉。他很少开口说话,也很少对我们展开笑容。孩子和他的沟通都透过母亲传达,甚至连他在生气,也都是妈妈咬着我



们的耳根:“你爸要处罚你了!”我们才知道。

父亲的木讷和严厉,使家里笼罩着一层高压的气氛,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无法把自己的感情倾吐出来,彼此很少沟通,大家都是闷着地一日日长大起来。而我,是家中性情最烈的,不像兄弟姊妹那般,以温驯听命的态度来尽子女的本分。我会表示不满、抗议,甚至以逃学、离家出走抗拒自己的不幸命运。

不过,在我有胆量和能力搞革命前,也就是幼儿到学前阶段,我只有以每个人都有的本能——哭,来表示抗议。

我的爱哭是极为出名的,连附近邻居都怕了我。我动不动就哭,而且只要嗓门一开,就没有人劝得了,只有在在我哭够了,觉得已经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时,才会甘愿地打住。而那时,我通常是筋疲力尽,喉咙都哭哑失声,

就地一瘫就累极睡倒了。

在那些无理取闹的哭阵中,我那已经被扫把竹条鞭答过的手和腿,会再加上很多条伤痕。但不论父母怎么吓我,或再加打几顿,我都不会妥协,继续哭,哭到大人们束手无策,反而会担心我哭伤了。那时,妈妈或者祖母会塞些我平常最喜欢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了一支蜡笔,希望我收住哭声。尽管这些东西都得存上一两个礼拜的零用钱才买得起,但我都会把它们扔得远远的。我记得,自己那时的脾气真是人鬼都怕。

我的爱哭,被亲戚们认为是极没出息的表现;叔伯在教训堂兄弟姊妹们时,都会引我的例子为戒:“像阿忠那款,你一世人就完了!”

然而,在小小的那个年纪,我却一点也不以自己的臭名为辱,还很得意地认为:唯独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头痛。

那种哭,是需要极大技巧和毅力的,动不动就长达两、三小时,除了身体承受不了,有时还会惹来没人的惨况。大人斗不过、哄不住,也就不再吓唬或施小惠了。于是,我往往会落得既可怜又可笑,独自在角落里,从轰轰烈烈的嚎啕变成有气无力的呜咽。想想不甘心,鼓起精神再来一场声势更壮大的,好证明自己没被打败。

我把每一场哭都当成突击战,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。然而,有一天,我再也不想哭了,其中缘故,正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壮烈长哭。

为什么而哭倒是忘了,只记得自己没阖眼地哭到天亮。从傍晚开始,我就往地上一坐,拒吃晚饭,拉开嗓门。妈妈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饭碗之后,把我的碗筷留着,将剩菜拨到另一只小碗里,无可奈何地向靠在门坎旁的我说:“哭饿了,就自己来吃吧!”

夜色急速地冷清而深沉,家里大小一个个洗过澡,准备上床睡觉了。每个人从我身边走过,都得把脚抬高一点,以免被我绊倒。

母亲邵华



毛新宇

7.外婆让刘谦初给肚里的孩子起个名字

为了省委扩大会议的顺利进行,外婆既是机要员又当警卫员,她打扫卫生、端茶倒水、放风望哨,直到五天的会议圆满结束,才歇了一口气。会后,外婆赴齐鲁大学、正宜中学、女子一中及鲁丰纱厂秘密活动,准备重建各种工团组织。可是,谁也想不到正在夫妻俩比翼齐飞大显身手之时,一场灾难却在悄然降临。

1929年6月26日,刘谦初要前往青岛、淄川、淄博、潍县等地,准备领导和发动青岛大康、隆兴和富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。夫妻俩相互嘱咐匆匆别后,外婆便按约去省委秘书长刘小甫家取文件,她见暗号如旧,便径直进门,想不到没走几步便被四下埋伏的特务摀倒在地。这时,外婆并不知道刘小甫已经被捕,所以敌人审讯时,她坚持说刚从湖北乡下来,慌忙中走错了门,而丈夫黄伯襄是齐鲁大学教授,有籍可查,最近去武汉探亲访友云云。敌人见她真的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妇,糊涂得连自己的街道住院也记不清,便只好以“共党嫌疑分子”的罪名将其关押。

8月6日,敌人将她与刘小甫分押到济南警备司令部,随着一声声寒气森森的铁镣声,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走了过来。“啊!”外婆差点喊出声来。眼前站着的,是她的丈夫刘谦初。“我是人家用照片对出来的。你一个乡下妇道人家,什么也不懂。”走近外婆时,刘谦初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边暗示着说。“先生啊!你怎么啦,你到底怎么啦?”外婆不顾一切地挣脱看守冲到了刘谦初面前。“我没有犯法,你不要着急,你已经有了身孕,他们不久就会放你出去的!周大哥和‘妈妈’盼着你早日回家。”刘谦初又一次提醒外婆。

原来,国民党济南司令部的股钧才和吴保甫与刘谦初都在北伐军当过兵,后来股钧才和吴保甫回到山东当上了国民党特警。他们通过刘小甫的妻子得知黄伯襄就是昔日的刘谦初,立即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刘谦初回到济南,听房东说外婆有一个月没回家了,便迅速

化装转移。谁知,在胶济路的明水站,两个便衣侦探拿着照片对上了他,就这样,他落入了敌人手中。

面对突如其来变故,外婆深深明白,如感情用事,他们夫妻必遭毒手。所以,她极力克制住心头的巨大伤痛,任凭敌人威逼利诱,惨无人道地施用“老虎凳”、灌辣椒水、上押杠、往指甲里插竹签等酷刑,尽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却一口咬定丈夫不是共产党。

刘谦初比外婆受到的酷刑更多,也更重。敌人见硬的不行,又采用“美人计”。他们派来一个女护士给他打针和护理伤口,那个护士长得很美,态度轻浮,企图以色相勾引刘谦初,使他丧失革命斗志,但刘谦初始终不为所动。后来那个女人又开始向刘谦初求爱,死缠硬磨,厚颜无耻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,刘谦初一怒之下打了她一个耳光。敌人恼羞成怒,用二十斤重的两副脚镣把他锁了五天。

虽然得不到任何证据,但在“宁可错杀三千,不可放走一个”的杀戮政策下,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判处刘谦初、刘小甫死刑,外婆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,并很快得到蒋介石“核准死刑,立即执行”的复电。

就在这节骨眼儿上,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派起了内讧,蒋介石逼汪精卫及其走卒,股钧才等正好划定在汪精卫一派,因此未来得及施刑便逃之夭夭。后来,案子转交到地方法院,因证据不足改判刘谦初、刘小甫八年有期徒刑,外婆被改判为半年。

正如刘谦初预料的那样,敌人见外婆有孕在身,何况也审讯不出任何秘密,便将她提前释放。出狱之日,患难夫妻隔门相见,泪如雨下,心如刀绞。刘谦初当着看守的面掏出两封信,看守瞅了一眼,不识字,便转给了外婆。这两封信,一封是写给由他介绍入党、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给向忠发当秘书的张采真的,让其转交给“母亲”;另一封是写给他同在北伐军第十一军办《兵路》杂志的董秋斯的,让他帮助照顾即将临产的妻子。

外婆让刘谦初给肚里的孩子起个名字,他说:“我早想好了。孔子说过‘见贤思齐’,意思是看见贤人就向他学习,不管是男是女,就叫思齐吧。山东自古为齐鲁之地,我们在这里工作过,也让孩子永远记得这里,记住我们在这里的遭遇。”

36.你到底想怎么样

袁朴生磕磕巴巴读完这段消息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老实说,报纸上说的这些东西,他一时还有些懵懂。可是,日本人却把他的国家琢磨透了,人家就是瞅准了咱的软肋下手的啊。突然他想起一个人,陶半坡先生。他学问大,通晓天下。要是他在,这会儿还有古子樱说话的份儿吗?而此刻古子樱正来了劲呢,还在不依不饶地说,清国衰败了,如今,跟一个腐败的国家打仗,大日本帝国岂能不胜?在这野心的海战中,我们有从英国买回的吉野号巡洋舰!清国的银子都用来给慈禧皇太后修造颐和园了,而我们大日本帝国呢,从天皇到子民,包括劳工、妓女、乞丐都在捐款,倾举国之财力买回了吉野舰,师傅,你知道什么是吉野舰吗?它的动力远远超过清国的任何一艘军舰!师傅,请你不要生气,清国的气数已到尽头了!

袁朴生听着心里一阵阵发闷,喝道:古子樱,你到底想怎么样?古子樱迎着袁朴生血红的目光,依然咄咄逼人地说:师傅,请叫我三岛雄夫!袁朴生怔住了。古子樱说,徒弟有一言相劝,师傅不要回到清国去了,留在日本,加入日本籍,师傅会成为大日本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急需之王!袁朴生听罢哈哈大笑,说,我袁某人,生是大清人,死为大清鬼,你若不再叫做古子樱,也罢,那我不再认你这个徒弟,呸,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!这句话出口,袁朴生觉得分量有些重。但古子樱却没有表现出震惊。显然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

古子樱不知什么时候走了,他还坐在那里一个人闷闷不乐,酒越喝越寡淡,背心里一阵一阵的寒意。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了。三岛家族一个人也不见了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,有一个人在他背后轻轻地叫了一声师傅。他一看,是鲤江高寿。说,你怎么来了?鲤江高寿有点担忧地看着他,说,师傅,你没事吧?袁朴生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,说,没事。国家打仗,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!鲤江高寿迟疑地说,今天晚上,师傅最好不要出去。拜托了!袁朴生一脸疑惑,问,出了什么事?鲤江高寿说,今天晚上,每家每户所有的人都会到广场上去庆祝胜利……袁朴生明白几分了,瞥了他一

眼,说,你也会去吧?鲤江高寿迟疑地点点头,说,虽然国家打仗跟老百姓没有直接的关系,但这是跟大清国在打,而且把清国给打败了啊!师傅,您要是日本人,您就会知道,打败大清国,对于我们日本来说,意味着什么?袁朴生的心狂跳起来,说,难道我大清真的败了?鲤江高寿说,今天的战报来了,清国的北洋舰队,被……全部覆灭了。袁朴生突然叫起来:不可能!大清国居然打不过小日本,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啊。他的心,真的像被谁狠狠啄了一口。不是尖锐的痛,是钝钝的,缓慢而持久的那种痛。鲤江高寿低声地说,师傅要多加保重,最近这几天不要上街。不管发生什么事,在鲤江心里,师傅永远是师傅。他发现鲤江高寿正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他。那目光像兔子一样温和水,但是,在袁朴生看来,那更像浸了水的鞭子一样。打仗的事他屁也不懂。但谁都知道,小孩是打不过大人的。跟大清国相比,日本不就是个小屁孩么?莫非日本有天兵天将相助?大清国的北洋水师,一直牛得很哪,现如今到底怎么回事啊?那些兵舰、枪炮,难道是纸糊的?那些官兵大爷们是干什么吃的啊!想哭,哭不出来,心里实实在在地憋着。他这才知道,国家打仗,原来跟他这个草根百姓是十指连心的。

人都走了。四周静得阴森森的。许久许久,院墙外隐约传来闹哄哄的声响,他走出大门。在路边一棵巨大的树荫下站住了。三三两两的人群,正扯着大大小小的旗子,纷纷往北涌去。一些穿武士服的人头上箍着白布条,狂热地呼喊着什么。其中有一个面熟的身影,走路一拐一瘸的拄着拐杖,边走边喊:大日本帝国万岁,打败清国,日本必胜!那个人居然是小野次郎。队伍里还有惠子和衫门昂立。他们有人说有笑的,好像在赶什么庙会似的。而老三岛跟老夫千代子居然也走在人群的后面,颤巍巍地挥舞着小旗子。古子樱呢?他一定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吧,说不定他还是今晚集会游行的策划者呢。还有,美智子呢,怎么不见她,她会不会跟古子樱在一起?日本人!他们是在爱他们的国啊。我袁某人的国呢?远在天边的大清国,陶先生,武师傅,水蓉,你们知道吗,日本人正在欢庆他们的胜利呢!

国壶

徐凤

